

《大唐西域记》研究与北京大学东方学的发展历程*

陈 明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今天在线举行的“教育援青”新书发布会暨跨文化中国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会，我谨代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对本次会议的举办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本次活动以及王邦维老师表示热烈的祝贺，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大唐西域记〉研究与北京大学东方学的发展历程》。

一、北京大学东方学科发展与玄奘研究

自1861年京师同文馆创办以来，北京大学的外语学科就一直秉承“外语是基础”这一原则，历代学人以多语种的外语教学为基础，开展域外的语言、文化、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教育、思想、文化等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6年8月成立的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在季羨林、马坚、金克木、王森、于道泉等学者的努力下，筚路蓝缕，开创了中国东方学学科的建制化之路，成为我国东方语言文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摇篮。北京大学不仅是中国现代东方学科建制化最早的高校，也一直引领着中国东方学的发展方向。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批准号：14ZDB084）的成果之一。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2000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在王邦维老师的不懈努力和带领下，是本学科唯一的国家级学术研究与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心秉承北京大学东方学的优良传统，在东方文学、语言、文化、宗教、图像学等研究领域不断开拓，以“东方大文学”为导向，从“文字、文本、文学、文化、文明”的多个维度切入更广阔范围的东方学研究，体现了“五文并举”的特色，即学习文字、细读文本、感悟文学、体证文化、传承文明；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进行深入而多元的比较研究，强调中外文化交流和走国际化的创新之路，从而体现了鲜明的外语基础学科与跨学科研究的特性。

在东方学领域占一席之地的印度学和佛教学研究，都离不开讨论玄奘法师这个人和他的一本书《大唐西域记》。从某个意义上说，北京大学对玄奘和《大唐西域记》的研究，是和东方学的发展同步的。向达、季羨林、周一良、金克木、王邦维等北大学者的相关研究，代代相继，连绵不绝。此处不妨从学术史的角度，简要回顾一下。

中华书局的谢方先生曾撰文详细回顾了北京大学学者与《大唐西域记》研究之间的关系。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之后，北京大学历史系向达教授拟定了一个《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计划，共收录古籍42种，所列的第二种书就是《大唐西域记》。当年10月，谢方受书局领导之命去拜访向达^①。1960年，向达撰写了《中外交通有关重要史籍丛刊整理缘起》^②，共4纸，其中提及“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校订过的本子，也没有一个加注的本子，就是最突出的例子”。1961年1月，北大历史系向中华书局提出了一个整理《大唐西域记》的计划。周一良教授给金灿然先生的信中指出：“关于《大唐西域记》，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包括向达、邵循

① 谢方：《忆我和向达先生的首次见面》，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中册，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年，第652—658页。

② 阎万钧编：《向达著译目录》，沙知编：《向达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319页。

正、季羨林、邓广铭和我)，由向达提出了几点初步意见，并就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校注的要求，我们认为应当超过所有外国的译本，表现出我国学术水平，体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和古为今用。”^①中华书局很快就赞同了北大历史系提出的这个计划。1961年12月1日，向达完成了《记现存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一文^②。1962年5月，向达再向中华书局提出了要搞《大唐西域记》一书的影印本、简注本、详注本三种本子的规划。“1963年，向达在北大历史系与中文系合办的讲座中主讲《玄奘和大唐西域记》一课，并将他收集的有关玄奘和《西域记》的资料，在教室内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会，共展出文物图片四十余件，很受学生欢迎。”^③1964年3、4月间，向达赴广州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商议《大唐西域记》注释本之事。陈寅恪以诗相赠，表达支持之意。当年夏天，向达完成了《〈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的辑录工作，并撰写了引言。同年，他还发表了《试论〈大唐西域记〉的校勘问题》一文^④，为整理《大唐西域记》奠定了基础。据蔡振翔介绍，该稿“完成于1964年10月11日，用线装装订成册，一共有23页，大约有9000多字，分为《前言》《略述所见各种本子》《校勘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后记》四个部分”。该手稿的“第23页在文末注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日觉明居士谨记于海淀之勺园精舍’，在第1页上还盖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红印章。由此可见，此稿大概是向达生前郑重其事地赠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该文的手稿原存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后交还给向达家属，日后流散出去，被蔡振翔购得。^⑤1966年11月24日，向达不幸因病去世，他整理的《〈大唐西域记〉

① 谢方：《二十六年间——记〈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出版兼怀向达先生》，《书品》，1986年第1期，第33—41页。

② 觉明居士：《记现存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文物》，1962年第1期，第31—36页。

③ 谢方：《二十六年间——记〈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出版兼怀向达先生》，《书品》，1986年第1期，第33—41页。

④ 向达：《试论〈大唐西域记〉的校勘问题》，《现代佛学》，1964年第6期，第19—27页。

⑤ 蔡振翔：《向达佚文〈试论大唐西域记的校勘问题〉评介》，《文教资料》，2009年8月号下旬刊，第45—46页。向达此文已经发表过，称为佚文欠妥。

古本三种》迟至1981年才出版。

夏应元《回忆向达先生晚年的几件事》一文中指出，在“文革”初期，“就在这场抄家的纷乱中，向先生所写的尚待发表的《大唐西域记注释》的手稿……至今下落不明，堪称为我国学术界一大损失”^①。阎万钧1980年10月撰写的《向达：敦煌艺术的拓荒者、西域文明的采珠人》一文记载：“一九六四年先生曾于中国佛教协会东院内整理《大唐西域记》，书中加有密密麻麻眉批，手稿存入北大图书馆善本部，近日听友人讲此书近期可由中华书局出版。”^②据谢方的记载，向达生前在《大唐西域记》金陵刻经处本上所做的校勘手记，确实曾保留在北大图书馆，后被吸收到《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一书中。向达对《大唐西域记》版本的整理、校注和研究，是“文革”前我国重要的东方学研究成果，其突出贡献不可磨灭。

二、季羨林团队与《大唐西域记校注》

国际学界对《大唐西域记》十分重视，不仅有多种不同形态的外文译本，还有日本学者的校注成果。而季羨林先生领衔的校注团队，1985年完成出版了《大唐西域记》最好的校注本，成为有国际影响的扛鼎之作。

据该书责任编辑谢方的回忆：“1978年8月18日，在北大东语系，由季羨林同志主持召开了《西域记》第一次工作会议，有孙毓棠、朱杰勤、宿白、张广达、杨廷福、张毅、耿世民、蒋忠新、赵守俨和我参加。会上决定了由范祥雍先生在上海单独负责标点校勘，由季先生在北京主持注释工作，具体分工如下：耿世民负责新疆部分，张广达负责苏联中亚及阿富汗部分，朱杰勤及张毅、蒋忠新负责印度部分，

^① 夏应元：《回忆向达先生晚年的几件事》，沙知编：《向达学记》，第193—194页。

^② 万钧：《向达：敦煌艺术的拓荒者、西域文明的采珠人》，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等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3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66—79页，此见第78页。

杨廷福负责原书三篇序及佛教名词、辞语部分，蒋忠新查对全书梵文，宿白负责全书插图照片（后因困难较多，没有进行），章巽负责绘制详细地图（后章先生因眼睛不便，也没有进行），季羨林最后负责修订定稿和撰写前言。”^①实际参加撰写的人员有：季羨林、张广达、朱杰勤、范祥雍、杨廷福、耿世民、张毅、蒋忠新、王邦维。该书1985年出版之后，被誉为“博取中外之长，纵考古今之变，是目前中外校释、研究《大唐西域记》的集大成之作”。1985年，季羨林、张广达、李铮、谢方、蒋忠新、王邦维、杨廷福合作完成的《大唐西域记今译》一书，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者实际上是《大唐西域记》系统工程的一部分，正如季羨林在《前言》中所说：“我们的想法是，让精校本、注释本、今译本和英译本这四种本子构成一个整体，互相补充，互相关照。”

有关季羨林与《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的相关工作，王邦维老师写了两篇文章，对此进行详细的说明。第一篇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域研究的力作：季羨林先生与〈大唐西域记校注〉》^②，第二篇是《季羨林与〈大唐西域记校注〉署名问题》。在后文中，他提到：“这个任务，最初不是季先生自己找来的，而是1977年底，当时的中华书局的领导约请季先生，要求季先生出面承担的。”^③

此处可以补充四条季羨林的书信材料如下：

1977年4月27日，季羨林给臧克家的信中说：“我仍然在写《印度佛教史》，整理《罗摩衍那》的译稿，写译序。还可能接到一个新任务，整理注释玄奘《大唐西域记》，还没有定。”^④

1977年11月21日，季羨林给杨廷福的信中说：

① 谢方：《二十六年间——记〈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出版兼怀向达先生》，《书品》1986年第1期，第33—41页。

② 王邦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域研究的力作：季羨林先生与〈大唐西域记校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20页。

③ 王邦维：《季羨林与〈大唐西域记校注〉署名问题》，《文汇报》，2014年8月25日第11版。

④ 季羨林著、蔡德贵编：《季羨林书信集》，长春：长春出版社，2018年，第32页。

廷福同志：示悉。寄来的《大唐西域记》也已收到，谢谢。朱杰勤同志处我已去信，等广州的同志来到以后，我们对于分工就可以比较细致地确定下来，看来我们组织建立工作已接近完成。应该说，我们的成绩还是不小的。特别由你来做具体的联系组织工作，是再好也没有的。将来工作如何进行？校勘体例如何？注释工作如何进行？注释的详略程度如何掌握？如何根据章老的校刊本进一步加工？这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目前抓一抓外文报刊的资料工作，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基础。此外，我还有个想法：以《大唐西域记》为中心组织起这样一个班子，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相互学习的机会。每个人都各有所长，通过几年的共同工作一定可以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北京藏书甲天下，各方的学人也有一些，治学问北京这个地方还是很有利的。你同蒋忠新同志最近走访了一些人，这是一个极有利的工作。这些人平常可能都互相闻名，也有同气相求的愿望。但因缺少一个机构，缺少热心的人，所以愿望终于只是愿望。你们这样一跑，大家就可以“同声相应”了。请代向蒋忠新同志致意。可否请他先借一本 H. Kern: *Manual of Buddhism*，看一看 Cosmical section 那一部分。因为《大唐西域记》序里讲的那一套东西（索诃世界等等），光看汉译佛经还是不太容易懂的。这种知识对于研究印度佛教还是很有用处的。

此致敬礼！

季羨林 十一月二十一日晓^①

1977年12月3日，季羨林给臧克家的另一信中说：“中华书局组织

^① 该信原刊杨同甫、杨象甫编：《追思录》，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又，曹旅宁：《由季羨林先生两封遗札追忆杨廷福先生》，《书品》，2014年第1期，第10—12页。该文对此信进行了讨论，并推测此信“时间应是1978年组织班子整理《大唐西域记》之始”。若说得更准确一点的话，该信写于1977年。

了一个班子注释《大唐西域记》，推辞再三，最后还是由我来‘挂帅’。心里又增加了一些负担。”^①

1979年5月2日，季羨林致函虞愚（北山）：“羨林前受中华书局之委托，偕同海内诸贤注释玄奘《大唐西域记》。素仰先生精研因明，深于佛学，切望随时加以指导。此书蜚声宇内，惜无注释善本，青年读者望而却步！海外译者，笑话百出。如能集众人之力，成此伟业，昌明学术，鼓吹升平，或亦先生所嘉许也。”^②

据李铮编的季羨林论著目录可知，1982年9月15日，完成《大唐西域记》第二、三卷的今译工作。1982年9月29日，完成《大唐西域记今译》前言^③。此外，季羨林先生的相关成果还有：《关于〈大唐西域记〉》（主要讨论了对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评价问题）^④、《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四十七言”问题》^⑤、《玄奘时代及其后两地的佛教信仰》等论文^⑥，进一步拓展了该书及其西域佛教史的研究。

三、王邦维老师的《奇人·奇地·奇书：玄奘与〈大唐西域记〉》及其新时代的相关研究

王邦维先生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我国著名中印交流史研究专家、印度学家。他是季羨林先生培养的我国第一位印度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曾在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等外国名校留学和做高级访问学者。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印度那烂陀大学董事会成员。现任北京大学东

① 季羨林著、蔡德贵编：《季羨林书信集》，第36页。

② 同上书，第161页。

③ 李铮编：《季羨林译著目录》（1929—1991），李铮、蒋忠新主编：《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④ 季羨林：《关于〈大唐西域记〉》，《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第3—12页。

⑤ 季羨林：《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四十七言”问题》，《文史知识》，1991年第1期，第53—58页。

⑥ 季羨林：《玄奘时代及其后两地的佛教信仰》，《延边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5—9页。

方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他主要从事梵语佛教文献、汉语佛教文献、佛教文学、中印文化关系史、中印文学、印度和中国佛教史、印度历史与文化研究，成绩卓著。已出版著作《佛经故事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佛教史话》《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跨文化的想象：文献、神话与历史》《玄奘与〈大唐西域记〉》等多种。

王老师曾是《大唐西域记校注》团队的最年轻成员。1982年夏，他硕士毕业，留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工作。他的第一项正式工作任务就是季羨林分配的审读《大唐西域记校注》书稿。其个人承担的具体工作有：协助季羨林修改初稿、核对引文、绘制图表、校对等，参与并见证了该书的成书和出版全过程。虽然他的硕博学位论文是研究唐代求法高僧义净的两部名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但他对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一直有浓厚兴趣，不仅出版了《大唐西域记》的译释本^①，还发表过多篇论文，具体列举如下：

《玄奘的梵音“四十七言”和义净的“四十九字”》（1997）^②

《玄奘与弥勒》（2008）^③

《历史怎样变为神话：玄奘与〈西游记〉故事的来源》（2012）^④

《求法与游学：玄奘如何成就他的学问？》（2017）^⑤

《也谈〈大唐西域记〉的“阙文”问题》（2021）^⑥

《文明与文化交融之地：玄奘记载的古代阿富汗》（2021）等^⑦。

① 王邦维译释：《大唐西域记》（译释本，繁体字版），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该书简体字版，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

② 白化文等编：《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25—230页。

③ 《弥勒文化与和谐社会》，宁波：宁波出版社，2008年，第4—16页。

④ 《新世纪图书馆》，2012年第2期，第3—16页。

⑤ 《人文宗教研究》，2016年第2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34—50页。

⑥ 《文史》，2021年第2期，第276—280页。

⑦ 《跨文化对话》第4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3—36页。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大唐西域记》新校注的工作呼吁再起。王老师除了在北大南亚学系和国学研究院多年开设《大唐西域记》研读的课程之外，还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唐西域记》研究：历史、图像和文学”（2013—2017）。以此为契机，从2013—2017年，他在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期刊，连续发表有关《大唐西域记》的系列论文，共20多篇，结集成《丝路朝圣：玄奘〈大唐西域记〉故事》（中华书局，2019）及其新版《奇人·奇地·奇书：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①。该书新版共收录了有关《大唐西域记》的28篇论文，深入比较与探讨了《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传说、人文地理、历史、物质文化、语言、宗教等诸多问题，不仅涉及历史、文学、语言、宗教、艺术等跨学科的研究，并且融合了王老师本人多次在丝绸之路的实地考察所见所闻，还配发了他自己所拍的精美照片。该书是王老师数十年研读之精髓呈现，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既是‘故事新编’，又是历史重现”，属于“大手笔写小文章”，深受各方面读者的喜爱。

王老师不仅身体力行，从事玄奘与《大唐西域记》研究，还花费巨大心血，建设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组织十四届全国东方文学研究生暑期学校和三届全国东方学与东方文学青年学者论坛，为培养学科的新生力量呕心沥血。他的学生也继承了研究玄奘与《大唐西域记》的传统，发表了不少的论文，比如周广荣的《谈谈玄奘对梵语声明学的译介与弘扬》^②、陈明的《〈大唐西域记〉中的佛教故事及其图像在丝绸之路的流传》^③。

在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世界形势越发诡谲多变的当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也促进了我国陆海丝绸之路以及与周边

① 王邦维：《丝路朝圣：玄奘〈大唐西域记〉故事》，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奇人·奇地·奇书：玄奘与〈大唐西域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

② 《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5期，第88—93页。

③ 慈光主编：《从长安到那烂陀：玄奘的生平与遗产》，上编，新加坡：World Scholastic Publishers，2020年，第196—217页。

文化交流史、冷门绝学的研究，而这些研究正是北京大学东方学的传统优势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明因交流而精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而玄奘是中国民族的脊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代表人物，《大唐西域记》正是中外文明互鉴的典范。不仅如此，玄奘、义净的著作或其佛经汉译本还有了藏文译本，《大唐西域记》的藏文译本出自清代乾隆时期蒙古族著名学者工布查布之手。可以说，《大唐西域记》一书成为中国多民族学习的经典，也将为当前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不凡的贡献。王邦维老师的《奇人·奇地·奇书：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一书正顺应了时代和人民的需求，在“一带一路”和“文明互鉴”的新历史语境下，应运而生，开启了《大唐西域记》研究的新格局。该书入选“教育援青”的书目，可谓得其所哉！该书对我国西部读者进一步熟悉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理解“文明互鉴”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也能为熏陶与培养有兴趣的学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践行者及研究者助一臂之力。

简而言之，以玄奘和《大唐西域记》的研究为契机，北大学者对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和中外文明交流史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导夫先路，而且对中国西部的文化、教育与丝路建设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谢谢！